

走向市场之路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市场的培育和发展



石通杨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PDG

实现农产品结构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必须积极培育农村市场，打破地区封锁、城乡分割的状况，进一步搞活流通，增强农村经济发展的开放性，使各种经济资源在更大的范围内流动和组合。这是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

摘自《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目 录

第一章 民族地区农村市场的形成与发展	(1)
第一节 民族地区古代市场	(1)
第二节 民族地区近代农村市场	(11)
第三节 民族地区现代农村市场	(15)
第二章 民族地区农村市场功能和要素	(21)
第一节 民族地区农村市场功能	(21)
第二节 民族地区农村市场基本要素	(23)
第三章 民族地区农村市场机制	(37)
第一节 市场机制	(37)
第二节 价格机制	(41)
第三节 竞争机制	(51)
第四节 供求机制	(59)
第四章 发展民族地区农村农产品市场	(65)
第一节 民族地区农产品市场现状	(65)
第二节 民族地区农产品市场的培育	(73)
第五章 民族地区农村生产资料市场	(83)
第一节 农村生产资料市场的含义与特征	(83)
第二节 民族地区农村生产资料市场的培育 和发展	(89)
第六章 民族地区农村消费品市场	(96)
第一节 民族地区农村消费品市场的特点	(96)

第二节	影响民族地区农村消费品市场的因素	(102)
第三节	民族地区农村消费品市场的培育	(106)
第七章	民族地区农村土地市场的培育	(109)
第一节	民族地区农村土地产权状况	(109)
第二节	民族地区农村发展土地市场的依据 和意义	(112)
第三节	民族地区农村土地市场的培育	(118)
第八章	发展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市场	(126)
第一节	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的性质	(126)
第二节	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市场的性质 和特点	(135)
第三节	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市场的作用	(141)
第四节	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培育	(144)
第九章	民族地区农村金融市场的培育	(148)
第一节	建立农村金融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要求	(148)
第二节	民族地区农村金融市场的培育	(154)
第十章	培育民族地区农村技术市场	(161)
第一节	技术和技术市场概述	(161)
第二节	培育民族地区农村技术市场	(167)
第十一章	民族地区农村信息市场的培育	(176)
第一节	信息商品与信息市场	(176)
第二节	民族地区农村信息市场的培育	(182)
第十二章	民族地区农村期货市场的培育	(188)
第一节	期货市场概述	(188)
第二节	民族地区农村发展期货市场的必要性	(199)
第三节	民族地区农村期货市场的培育	(203)

第十三章 民族地区农村市场调控	(212)
第一节 农村市场国家干预的必要性	(212)
第二节 国家宏观调控农村市场的重要手段	(217)
主要参考书目	(227)
后记	(228)

第一章 民族地区农村市场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节 民族地区古代市场

一、市场的概念

我们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来考察一下市场的形成。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人类社会开始的一个漫长岁月里，人们过着一种原始共产主义生活。当时，没有社会分工，没有私有制，自然就没有市场，没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行为发生。

当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初期发展到中期阶段以后，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生产工具的发展，如弓箭发明以后，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加强和提高了。人们从狩猎中捕捉的动物，把一些进行人工饲养，如牛、马、羊、猪等驯服后饲养繁殖，能够保证经常得到的乳类、肉类、皮毛等生活资料。于是人类在较好的天然草场逐水放牧，从事原始的牧业生产，成为游牧部落。而另一部分人从事采集和渔业发展到种植业，开始原始农业生产，固定居住地点。这是人类社会第一次社会大分工。

第一次社会分工之后，使劳动生产率有了显著的提高，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由于原始牧业扩大了生产范围和场所，使牧业生产者生产出的产品除了维持自己生存需要外，还有一些剩余产品；原始农业的劳动者则扩大耕地面积，增加农作物的品种，提高了产量，除了自己生活需要外，也有剩余

产品。同时，农业生产中又出现了铁制农具、矿石冶炼、金属加工，织布机等手工业生产。由于人们都需要获得本部落不能生产的产品，这就引起了彼此之间交换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使交换由偶然性发展到经常性行为。

原始社会末期部落间的交换都是通过部落首领进行的，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逐步过渡到了个人和个人之间的交换。这时的交换也还是剩余产品的交换，并不是为交换而生产的商品交换，当时的市场只是起到互通有无的作用。

随着铁制工具的出现和应用，人们可以进一步扩大耕地面积，开发广阔森林，农业有更大的发展，除了种植粮食作物外，还能种植桑、麻等作物。同时纺纱织布、酿酒、冶炼等手工业日益发展起来，市场交换的不断扩大和频繁，人们通过无数次的交换意识到，社会分工可以获得比原来更高的生产效率，尽可能以最少的劳动消耗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于是手工业又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这是人类社会第二次大分工。正如恩格斯在著名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所指出：

“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农业和手工业之间发生了进一步的分工，从而发生了直接为了交换的、日益增加的一部分劳动产品的生产，这就使单个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变成了社会的迫切需要。”^①这样，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便开始出现。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交换也发展起来，市场也随之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开始分离，从事商品生产者不经营商品的买卖，而经营商品买卖的人不生产商品，社会出现了商业和商人。商人的出现，商品交换扩大，市场也就发展起来。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市场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社会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1页。

分工是市场形成的基本条件，市场随商品交换而产生，又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而发展。市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场合，具有不同的含义。我国古代的市场仅仅是指产品交换的场所。《孟子·公孙丑下》中说：“古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司者治之耳。”这是说以物易物的场所。远在四千年前，我国就有市存在，这种市还处萌芽阶段，极不发达，只是买者和卖者在一定时间聚集在一起进行交换有形的地点，是一个地理、空间上和时间上的概念。我国古代把市场描述为：“日中为市，至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这是市场的原始概念。现在我们所言的乡村集市贸易市场、食品店、百货大楼，农村常把集市称为集、墟、街、场、会等，都是把市场理解为一定的地点、场所。所以，狭义上理解市场的概念，市场就是商品交易的场所。

二、民族地区古代市场

1. 西北民族地区古代市场

我国西北地区早在殷周时期，黄河上游和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就有统称为“戎”和“羌”的居民在活动，从事畜牧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些民族已从原始社会末期向奴隶社会过渡。到了秦汉时期，在今塔里木盆地周围的绿洲和天山北麓部分地区，分布着一些由突厥语民族组成的奴隶制城邦政权，史称为“西域三十六国”。这些城邦国社会分工已有很大发展，农业生产和畜牧业生产以及家庭手工业生产都相当发达。农业产品主要有粮食作物、葡萄、石榴、苜蓿、瓜果、棉花、药材等，家庭手工业已达到相当水平，主要行业有酿酒、制玉、棉毛纺织，铁、铜、银的冶炼和铁、铜、银制品的生产。商品经济有相当的发展，交换也随之发展。商品从物物交换发展到以金属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买卖，出现了许多固

定或不固定的市场。西汉王朝为了开辟和保护经西域通往中亚和欧洲的商路，派了张骞去西域探路，随后汉朝廷又派军队进入西域，并在西域轮台、渠犁、车师、伊吾等处屯田，开通并维护了“亚欧丝路”，丝道所经之处，又设驿站，这些驿站和屯田据点，是当时“丝道”上的市场。如玉门、鄯善、伊吾、车师、高昌、莎车、焉耆、哈密、于阗等都是当时“丝道”上有名的市场。唐代以后，西北民族地区逐步进入封建社会，西北民族地区商品经济又进一步发展，市场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西北民族地区与内地的贸易量不断扩大，回纥经常有成千上万的员使、商贩往来于长安，并有成千人留住长安和到全国各地经商，每次运来内地的商品除香料、药材、玉石、皮毛外，大宗的货物是马匹，常进几千匹上万匹，而从内地运回去的商品多达几千驮载，丝绸多达10万匹。^①参与商品交换的有官吏、商人、农牧民等各方面的人员，交易场所遍及“边州”。这些市场都很发达，交换的商品有铁、铜等金属工具、用具、武器、钱币、丝绸、布帛、粮食、茶、文化品等为大宗。到了宋朝，西北回鹘人从事经商的人很多，西北与内地的商品交换进一步发展，沿边州郡都是市场。到了明清时期，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又进一步发展，市场更加繁荣。由于丝绸之路贯通东西方的经济联系，喀什、叶尔羌、英吉沙尔、和阗、乌什、阿克苏、库车、辟展、哈密、吐鲁番、哈喇沙尔等都形成较大的市场。内地的商品金、银、铜、铁制品和冠带、金属货币、金银首饰、纺织品等不断运往西北地区市场，而西北地区的马匹、药材、香料、装饰品、玉石、皮毛等流入内地。由于商品交换品种和规模的扩大，西北民族地区出现许

^① 转引自《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集》上集第321—322页。

多繁华的商业中心市场和专业市场，《西域闻见录》记载，当时哈密是“商贾云集、百货俱备，居然一大都会。”阿克苏汇集伊犁、哈什、叶城、吐鲁番商人，“每逢八棚会期摩肩雨汗”，可见繁荣景象。叶尔羌城有来自山西、陕西、江苏、浙江等地商人，不辞远险，前来经商，“而外藩商人，如安延、遐摆(今拉达克)、克什米尔等处皆来贸易，每当会期，货如云屯，人若蜂聚，珍奇异宝，往往有之，牲畜果品，尤不可枚举。”茶马互市的专业市场，自汉开始，到明清时最为繁荣，青海的西宁、赤岭、甘肃的镇原、平凉、静宁、天水、张掖等都是历史上有名的茶马互市市场。

2. 西南民族地区市场的形成与发展

西南民族地区包括贵州、云南、四川、西藏四省区。西南地区古代居住着诸多的少数民族，汉代把这些少数民族统称为“西南蛮”，这些少数民族也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到了唐代，这些少数民族才逐渐进入奴隶社会。以云南洱海地区为中心的今彝族、白族、纳西族的先民(即乌蛮、白蛮)联合周围的其他民族，建立南诏地方政权，南诏政权一方面强迫被征服的部落民族从事农业生产，又通过战争掳掠到成批汉族各类工匠，作为奴隶，从事手工业生产，传播内地先进生产技术，使南诏的手工业相当发达，当时的纺织业已达到内地的先进水平，采矿、淘金、引水灌溉等也相当发达。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交换发达带来商业的繁荣，南诏境内出现了许多发达的商业市场，如大理、喜洲、昆明、保山、铁桥(丽江北塔城)、银生(今景谷至西双版纳一带)、镇南(今景洪)等市场，其中喜洲已是当时南诏境内的商业贸易中心，铁桥是与吐蕃行进畜产品交易市场、昆明是与广西、贵州和安南贸易市场，银生和保山是对东南亚和海外贸易市场。

西藏在七世纪初，雅隆部落首领松赞干布兼并了邻近各部，统一西藏，以拉萨为都城，建立吐蕃政权，进入奴隶社会，西藏商品生产有所发展，藏族人民以马匹、皮毛、药材、香料换取内地茶叶、丝绸、铁器、金银首饰等商品。其中以茶马市场规模大。宋朝时期开辟了雅州（四川雅安）、碉门（四川天全）等为茶马互市专业市场，由拉萨到雅州和天全沿途的汉源、泸定、康定、理塘、巴塘、察雅、昌都、硕嘎嘉黎、大昭、道孚、甘孜、绕格、江达等都是当时的大小市场，其中康定成为西藏与内地贸易中心。

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对中南、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政策，使农业、手工业生产得到进一步发展。农业学习汉族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农产品产量大大提高，手工业已达到相当水平，自己能制造精良的农具、织具、服具、食具等，纺织、印染都有较高的水平，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交换日益活跃。在贵州地区出现一些较为发达的商业市场，明代的思南、古州已成为商业的通都大邑，当地有名的市场。到了清代，贵州的铜仁、古洲、浦市、泸溪等镇已是远近闻名的市场。两广两湖和江西的客商涌入，使这些市场更加繁荣。

四川凉山地区是彝族的聚居地区，自秦设置郡县，古称邛都，汉又以邛都为越巂郡，辖15个县。内地商人不畏艰险、山高水寒，将内地的铁器、铁质农具、盐、布、酒、装饰品等商品贩运到彝区去卖，又从彝区买回畜产品、药材、林产品等商品。在凉山地区逐渐形成许多市场。《雷波厅志》记述：“土产沃富，远货他乡，而白布红盐，则取货于外郡，是以道途虽远，商贾流通，远方之人，闻风麇集”。“中山坪、罗三溪两场，商贾云集，每逢街期、汉彝赶集者七八百人。”又《叙州府志》说：“马边，其逼进夷地凡有市地方，每逢赶集场期，彝人

撤出贸易，更有彝人通事，由该场店铺客民留其长住，资其口食，往来场上有待交易者，谓之交口蛮，专为经纪贸易”。同治初年昭觉筑城以后，成为当时凉山地区较大的市场，逢街期有上千人赶集，销售盐巴二百斤，布匹、铁矿、针线等不计其数。

3. 中南民族地区市场的形成与发展

中南民族地区包括两广两湖和海南五个省、自治区。那里诸少数民族也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大约在春秋时期进入奴隶社会，如广西壮族的先民在春秋时期已进入铜器时代，出现了阶级，进入了奴隶社会。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商品经济得到发展，商品交换频繁，形成大小规模不等的市场。如桂林、南海、象郡等。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派50万大军分五路进军岭南，在岭南设置桂林、南海、象郡三个统治中心。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后，在岭南设置苍梧、郁林、合浦、南海、珠崖、儋耳、交趾、九真、日南九郡。这些郡成为岭南的主要市场，聚集了商人和手工业者，当时上市的商品有粮食、布匹、水果、木材、铜器、银器、牛、羊、猪、鸡等。到了唐代，岭南的诸少数民族大部分进入了封建社会，农业用牛耕地，围塘蓄水，引溪灌溉、水稻播种育秧、中耕除草、的石施肥等先进技术。在农业生产有较大发展的同时，手工业产品的铜器、陶器、纺织品等生产技术和工艺达到相当高超的水平。如铜鼓的制造“大者于一丈，用铜铸其身遍有虫鱼花草之状，通体均匀厚二分以外，炉铸之妙，实有其巧。”^①纺织品都落布、丝布、竹布、蕉布等，工艺精致、质地精美，许多被选为贡品。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桂布白如雪，吴锦软如云，布重锦

① 刘恂：《岭表录异》卷上。

且厚，如裘有余温”的诗句^①。反映当时广西壮族手工业的水平。商品经济的发展，交换繁荣，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市场不仅多，而且繁华。当时的桂林、柳州、邕州、阳朔等都是较大的市场。如唐代时的阳朔经常是“胥吏、黎民、商贾夹以而居”，有“籍户五千，其税婚钱20万”^②，说明当时阳朔市场兴旺繁荣。南宁、钦州已成为中南、西南商品贸易市场。同时，也是我国对东南亚贸易通商口岸。宋朝时，邕州“永平寨博易场”，“交人（交趾人）日以名香、犀、象、金、银、盐、钱与吾商易缕、锦、罗布而去。”^③钦州城外的“江东驿博易场”，不仅交址的富商前来贸易（称作“小纲”），而且也由交址遣使前来买卖（称作“大纲”）^④。到了明代，广西集市贸易大发展，市场遍乡村各地。以横州一地为例，“虽止十五里，有村八百余，虚（即集市）百余，一虚每期贸易财货不下数十万，陶虚、百合、青桐、古辣则其尤大者云。”^⑤平均每八、九个村就有一处集市，每期集市的贸易量达数十万之巨，上市的商品有粮食、布帛、酒、牲畜、铁制农具、壮锦、木材、药材、皮毛等，表明当时广西商品经济有相当的发展，市场发展到相当水平。在湘、桂、黔交界地区的广西三江县古宜镇是当时远近闻名的木材市场，来自安徽、江西、陕西等地的客商云集该镇，并在镇上设置商号，收购木材。而当地的苗、侗、壮等民族借此开设“歇店”，“代办木材的介绍、议价、驿银和收购等业务”，实际上是商业经纪人，该镇的木材市场非常繁荣，一直延续到近代。

① 《白氏长庆集》卷1。

② 《古今图书集成》卷1104。

③④⑤ 宋代周去非：《岭南杂答》卷五，财计门。

海南岛是黎族聚居地区，汉代就在海南设置郡县，内地的先进生产技术传入海南，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发展，商品经济也随之发展起来。到了明清时期，海南商品经济已有较大的发展，商品交换频繁，海南的市场也就发展起来。明嘉靖年间，儋州地区，州有市场，乡镇有墟场，每三日一集，“早晚一次会集货物”，^①黎族同胞以牛、槟榔、椰子等上市贸易，换取内地的铁器、布、酒等。到清乾隆年间，在黎汉交界处又出现许多墟市，如儋州的调南市，临高县的兰洋市、南丰市，定安县的岭门市等。吸引大陆许多商贩到黎区进行买卖活动，以布、盐、绒线等商品换取黎族的黎锦、黎布和山上的土特产。

4. 内蒙古及东北地区市场的形成与发展

在我国蒙古辽阔的草原上，早在商周时期，这里先后出现过“鬼方”、“猃狁”、“戎狄”等部落，到了战国时期，许多部落发展成较大的部落联盟，当时匈奴族是发展较快的部落之一。到了秦汉之际，匈奴社会已出现了阶级，进入奴隶社会，商品已有所发展，开始与汉族地区进行贸易。匈奴之后，蒙古草原上先后出现过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契丹等民族建立地方政权，以畜牧业经济为主的游牧民族。到了唐末五代时期，由于战争关系，河北一带的汉族军民流亡或被俘而入契丹，石敬塘割云、燕十六州给契丹后，汉族的生产技术流入北方草原，由于众多的汉族流入契丹，契丹的农业、手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到了宋代，契丹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建了辽政权，草原上的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与宋的沿边开展互市贸易，设立了许多市场。宋在宋境内的镇、易、雄、霸、沧等州设置市场，而辽也先后在涿州新城、静武军、朔州设置市场。在这些

① 《海槎余录》

市场上交换的商品主要有香料、犀、象、茶叶、苏木、牛、羊、马、银、钱、布、驼等。年贸易额有时达20万贯之多。宋卖给辽的铜、锡年达百万斤，宋买进辽的羊年达40万只，数量之大，可见一斑，这些边境市场相当繁荣。

12世纪，蒙古草原上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蒙古族正式形成，出现于世。它同其他的少数民族一样，也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随着畜牧业经济的发展，手工业也发展起来，手工业主要有皮革、毡毯、弓箭、铁业、木业、造车业、帐幕木架、家具、刀剑、甲胄等。13世纪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上各部，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元朝建立后，蒙古草原上的农业生产吸收汉族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使农业、牧业都有长足的发展。蒙古人用畜产品与内地交换纺织品和金属工具，交换的发展，促进市场的发展，当时上都、和林、应昌市场都较为发达。到了明朝，从1318年至1388年间，明朝东起辽东，西至嘉峪关及关外哈密的广大地区设置了20多个蒙古卫所，并允许蒙古卫所定期朝贡，蒙古卫所利用朝贡进行交换，这些卫所逐渐成了市场。到了十五世纪初，明又在辽东地区的开原、广宁两地辟为市场，16世纪又开辟蓟州、喜峰和义州市场，在西部地区从1408年起，先后在甘州、凉州、兰州、宁夏开设“马市”，1571年又开设张家口、守口堡、得胜堡、新平堡、山西水泉营、延绥之红山边墙閘门、宁夏的清水营、中卫、庄浪、高沟寨和铧尖墩等处市场，以后又在长城沿边设置16个市场。这些市场都相当繁荣，年交易仅马匹约10万匹，银约100多万两。到了清代，蒙古地区商品经济又有较大的发展，定居的农业形成一个独立的经济部门，手工业以酿酒、制粉、榨油、制靴、马具、刀子、钢锡木制器皿、首饰等，商品经济发展，引来内地大批汉族商人到草原上去做生意，从而影响了部分蒙古族转

营经商，这样，蒙古地区的寺庙、兵营周围成了集市贸易中心，出现了一批草原上市场，如归化、绥远、多伦诺尔、赤峰等市场十分发达和繁荣。

我国东北地区早在商周时代，长白山以北、黑龙江流域，东至大海的广大地区居住着肃慎人，到了汉代三国时期，住在长白山以东的肃慎人诸部落中，“挹娄”人从狩猎转到开始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到了隋唐时期，“勿吉”和“靺鞨”取代了“挹娄”人。八至十世纪，“靺鞨”人与高句丽人共建立了渤海国政权，这时进入奴隶社会，农业和手工业都得到较大的发展，北宋初期，“靺鞨”人改称为“女真”，部分“女真”南迁，学会了冶铁技术，由于生产工具的改进，经济又得到迅速发展，于12世纪初，“女真”人建立了金朝政权，十七世纪“女真”人进入封建社会，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建立了后金政权，1636年皇太极称帝，改后金为“大清”，更“女真”为“满州”（即满族），东北地区经济又迅速发展，手工业磨坊、粉房、油房、酿酒、鞋帽等都有较大的发展。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交换频繁，于是出现了许多市场，如齐齐哈尔、海拉尔、延吉、满州里等都是当时较大的市场。

第二节 民族地区近代农村市场

一、西北民族地区近代农村市场

19世纪中叶，我国少数民族地区部分地区已进入封建地主经济的发达阶段，商品经济已相当发展，手工业作坊、工场已雇佣一些工人，开始具有某些资本主义经济因素。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少数民族地区也因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而被卷入商品经济的范围，农村自然经济解

体，成为帝国主义倾销商品和掠夺工业原料的市场，这在客观上使民族地区部分地方农村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出现一些近代工业和手工业，形成一批近代农村市场。

在西北民族地区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的发展，古老的市场继续繁荣，又兴起一批近代市场。1875年左宗棠率清军进军新疆，开发新疆，促进新疆经济发展。1884年设立新疆省、加强了新疆与内地的联系，新疆商品经济发展较快，传统的地毯、毛毡、大布、马鞍、刀具等手工业发展较快。光绪年间，新疆南疆一带出现较大规模的手工业工场，年生产地毯达1700多条，毛毯78000多条，大布20多万匹。清军进军新疆时，陕西、甘肃、河南、山西、两湖和直隶等省大批商人随着涌入新疆去做买卖，有的定居下来，其中直隶省天津卫杨柳青镇人数最多，至光绪末年，杨柳青人在新疆各个市场开办商号100多家，形成了有名的“天津帮”，他们在迪化（乌鲁木齐）开办同盛和、广兴和、德聚和、同润和等几十个商号，经营绸缎、布匹、香烟、茶叶、百货等，另一部分人开设金屋银楼、澡堂子、戏院、烧锅（酿酒）、药店等，还放牧羊群，同时把新疆的皮毛、沙金等商品运回内地或与沙俄交换方糖。使迪化成为我国西北地区近代最大的市场，商品贸易中心。鸦片战争后，沙俄的魔爪伸入新疆，强迫在新疆开辟伊犁、塔城、喀什、吐鲁番、奇台、乌鲁木齐为商埠，倾销沙俄的商品和输出剩余资本，建立工厂和开矿等，对新疆进行经济掠夺。但是，客观上也使这些地区城市和农村市场发展起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周围的县、乡村市场也发展起来，如鄯善、巴里坤、伊吾、于田、阿克苏、拜城、库车等县农村市场发展起来。

青海省近代是马家军阀控制的地区，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仿效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在西北地区开办一些近代工